

DA QING DI WANG

大清帝王

乾

隆

远方出版社



大清帝王

乾 隆

主编：朱学勤

责任编辑:齐铁英

大清帝王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县京华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0 字 数 2080千字

版 次 2004年12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印 数 1—3000套

ISBN 7 - 80595 - 762 - 2/K·58

定 价:312.00元

目 录



第一章	初登大宝	(1)
第二章	改土归流	(63)
第三章	惩治贪污	(74)
第四章	盛世气象	(100)
第五章	平定内乱	(122)
第六章	两征安南	(138)
第七章	秋猕谒祖	(162)
第八章	西巡五台	(182)
第九章	文化典籍	(191)
第十章	文化政策	(197)
第十一章	盛极而衰	(219)
第十二章	农民起义	(232)
第十三章	名帝之死	(253)

第一章 初登大宝

—

“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

——这是乾隆皇帝的肺腑之言，也是十八世纪中国传统政治的格局。

封建时代赋予了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运筹大业，号令天下，几乎无时不在迟纵和影响人类历史的命运。

乾隆皇帝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以乾纲独断的统治作风，使有清一代的专制统治登峰造极。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的深秋，北京西郊的圆明园里传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雍正皇帝驾崩了。

一切都来得过于突然。

八月二十日，中秋佳节刚过，整个圆明园还沉浸在节日喜庆的余悦中，雍正皇帝却生起病来。龙体不豫，本是朝廷中的大事，但一连两日，皇帝听政办事如常，并没有异样的感觉，谁知，到了第三天，即二十二日，皇上竟然病倒了。

圆明园里开始忙乱起来。

圆明园虽说是离宫，皇帝一年之中倒有大部分时间驻蹕于此，每年自新正行毕郊礼即移避园宫，到冬至大祀前才返回紫禁城。紫禁城内的阴森、肃杀之气，怎及得有亭台园林之胜的圆明园呢！故而。圆明园里不仅有内阁六部等办事衙门，也有护军管、御膳房、太医院等随侍机构。

御医亲侍榻前，开出一个又一个的药方，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到了戌时（晚上七时至九时），伴随昏黄残照的暮色，雍正的病情急剧地恶化。作为一名大权在握的君主，一个时时主宰别人命运的人，也许此时，他才真正领略到无奈的悲哀。雍正已经感到了末日的来临，他用尽了平生的最后一把气力，下达了他帝王生涯中的最后一道诏

旨：“立即传命召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讷亲、内大臣海望入宫。”

晚上十点左右，宣召入宫的命令到达诸王大臣的府第。这些白日还见得龙颜的大臣们，被这入夜之后的突然宣召搞得心惊肉跳。他们疾起整衣，手忙脚乱地赶到圆明园。当他们被待于园宫西南门的内侍引入寝宫后，立时“惊骇欲绝”，预感中的不祥，得到了证实，皇上已濒临弥留的关头。

雍正并非多病之躯，而且由于体魄健康，他在即位之初，几乎是没日没夜的埋头于那些奏折文牍中，由此成了以勤政闻名的皇帝，但头几年的日里万机和事毕躬亲，不能不使他操劳过度。自雍正六年（1728年）以后，年逾半百的皇帝，身体是每况愈下。

生为帝王，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却无法摆脱大自然生老病死的规律。于是，向以却病延年著称的道士方术，打动了那一颗颗渴望长命百岁的帝王心，就连雍正这样精明强干的英主，也与道士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约自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随着雍正皇帝被疾病缠身，圆明园里便燃起了长年不息的阴阳火。在烟雾缭绕、神玄莫测的气氛中，一批又一批的金丹出炉了。然而，这些被雍正称作颇见“补益元气”之功效的丹药，并没有使皇帝延年益寿，兴国广嗣。雍正一病不起，且猝然发作，当时就有人怀疑他是服丹中毒。但是这种有伤皇帝体面的事情，在宫廷中一向讳莫如深，即使王公大臣也不敢妄发一言。

这时，先后到达的王大臣们，到御榻前请安毕，便都退出门外，候于廊上阶下，整个园宫笼罩在惨怛忧伤的气氛中。每个人的脸色由先时的惊慌，渐渐变得凝重衰戚，伴随轻声的低语，不时发出声声感叹。谁都明白，他们即将面临着“天崩地坼”的时刻，皇上那发青的脸色，神志不清的症状，都使人感到病入膏肓的无望。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人们在痛苦的煎熬中期待着转机，期待着“死生反掌”的奇迹。然而，“太医进药无效”，到了二十三日午夜子时，未及花甲之年的雍正皇帝便六脉俱脱，魂归西天了。终年五十八岁。

随着报丧声一起，寝宫内外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哭声，“大丧”的一应事项就此宣布开始。但在王公大臣们的心里，却有比大丧还要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新皇帝的即位。

天下不可一日无主，国家不可一日无君，然而雍正皇帝猝然崩

逝，没来得及口传遗命，恸哭失声的文武大臣不禁面面相视，露出不安的询问目光。虽说早在雍正元（1723）年，雍正皇帝即已秘密确立了储君，而且在众人心中也都清楚，嗣君当为皇四子弘历，可这有关国本的大事，又岂能无凭无据呢？

雍正并非没有安排，只是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他的心膂股肱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人们的窃窃私语和饮泣声中，鄂尔泰和张廷玉公开了这个秘密。他俩对庄亲王、果亲王和诸大臣说：“大行皇帝（指死去的皇帝）因传位大事，亲书密旨，曾示我二人，此外无有知者。此旨收藏宫中，应急请出以正大统。”

原来，雍正皇帝自即位后的元年八月制定了秘密建储制度后，便把写有储君名字的密旨贮于锦匣，收藏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额后，又另书一道朱笔密旨随身携带，以备万一时勘对之用。雍正一向严厉忌刻，很少信及他人，对秘密储君，自然不会轻易透露。可是，雍正七年（1729年）入冬以后的一场大病，使得皇帝对自己的身体丧失了信心，他自以为将不久于人世，便于次年九月，将建储的密旨告诉一向谨慎用事的心腹大臣张廷玉，以托后事。

雍正十年（1732年），正月，又将这一秘密扩大到另一心腹大臣鄂尔泰。他同时召见两人宣示密旨，嘱咐他们严守秘密，声称除“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因而，除了雍正帝本人之外，鄂尔泰和张廷玉便是这道密旨的见证人。

嗣君已有所属，社稷即有所托。诸王大臣们立即传召总管太监，令他请出密旨。他们急切地期待着。却没有一个人的心境是平静的。因为新皇帝将直接关系到他们每个人今后的前程和命运。

但是，这道随身的密旨究竟放在哪儿了呢？谁也不清楚。总管太监为难地说：“大行皇帝未曾谕及，我辈不知密旨所在。”

众人的目光又转向鄂尔泰和张廷玉。只见张廷玉不慌不忙地答道：“大行皇帝当日密封文件，谅亦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者，即是此旨。”

按照张廷玉的提示，未过多久，总管太监果然从雍正帝的诸多书简和遗物中找到黄函一封，捧到了诸王大臣的面前。张廷玉当众打开遗诏，在灯下宣读起来：

“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间，朕于乾清宫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藏于乾清宫最高处，即立为皇太子之旨也。其仍封亲王者，盖令各位藩

封，谳习政事，以增识见。今既遭大事，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张廷玉的话音刚落，弘历已泪流满面，痛哭失声了……

自雍正病情发作，弘历便与五弟和亲王弘昼侍疾于父皇榻前，他并没有想到此时竟是他与父皇的永诀。雍正的突然晏驾，令他震惊，他“哀号仆地”，悲痛不能自己，然而，几分钟之后，他成了皇帝，一个统治亿万臣民、天下至尊的皇帝。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为了这顶皇冠，历史上不知酝酿了多少诡谲的阴谋，产生过多少流血的厮杀和攘夺。如今，皇位轻而易举、名正言顺地归他所有，他不能不从心底感激父亲对他的特殊宠眷，感慨命运对自己的垂青。悲喜交加的情感，使刚刚收住眼泪的弘历，又痛快淋漓地“大恸”起来。

弘历在父丧的哀戚声中，在诸王大臣们恭诚的叩拜和敦促下，接过了这象征最高权力的皇位。他根据父皇临终的遗命，宣布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鄂尔泰，张廷玉四大臣辅政。一个以新皇帝为核心由先帝生前宠信的宗室大臣为辅佐的最高权力机构就这样诞生了，而这一切，距雍正帝的崩逝不过一两个时辰。

天还没亮，弘历奉雍正帝的遗体返回了紫禁城，在他的主持和率领下，当天下午，皇太后、皇后、妃嫔、皇子以及宗室贵戚、朝廷命官，齐集内廷剪发成服，将雍正的遗体入殓。

一连三天，弘历都在异常的忙碌中度过，大丧在肃穆的气氛中成礼。接下来的，当是嗣皇帝的登基。

八月二十七日，清廷向全国颁布了雍正皇帝的遗诏。九月三日，弘历在祭告了天地祖宗之后，于紫禁城内的太和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随着他诏告天地，宣布改明年年号为乾隆元年的那一刻起，乾隆皇帝便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这年他刚刚二十五岁。

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人，当他第一次坐在金碧辉煌的御座上，俯视着王公百官匍伏于他的脚下，听着震荡整个大殿的山呼万岁声，他领略到从未有过的喜悦和最大的满足。这坐落在紫禁城中轴线上的宝座，是真正的天心地胆的位置，它象征着对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的最高支配权，谁拥有了“宝座”，谁就拥有了天下。他一时陶醉于这一“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场景中……。

然而，登基的喜悦，很快被一个令人忧烦的谣言冲淡了。

就在雍正皇帝死去的当天，有关他死因的传闻沸沸扬扬，在京城内外四处而起。有人说，皇帝被一女侠行刺而死，不得令终，刺客正是当年他以戮尸枭示处以极刑的文字狱案犯吕留良的孙女。当时，雍正帝将吕氏子孙或斩决或发遣为奴，唯其孙女吕四娘漏捕逃亡。传说

她学得一身武艺，为报仇雪恨潜入宫中，并以飞剑砍掉了雍正的脑袋。

也有人说，雍正帝的死与那西郊上空长年不断的袅袅青烟有关……

前种说法，流传街头巷尾，几乎成了民间百姓茶余饭后谈论的中心。但它过于神奇怪诞，往往令人难以置信。倒是后一种传闻，使弘历大伤脑筋。从宫廷中太监宫女们的切切私语和诡谲的神色中，弘历意识到，父亲服丹中毒的隐情已被披露于众。而一个号称精明强干的君主，因崇信神道而致丧命，这无论如何都是过于昏聩的举动。生性好强的弘历，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为了维护先帝的形象，也为了他自己的那份虚荣，他决定以强权的手段，封住众人的口。

八月十五日，即雍正帝崩后的第三天，新皇帝将几个道士赶出宫中，并颁旨诏示天下。他说：

“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乾隆急于洗刷父亲身上的“污迹”，匆匆忙忙抛出了这道上谕。然而，刚刚登上大宝的新皇帝却忘了投鼠忌器。他那“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的表白，反倒给人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完全暴露了雍正帝对炼丹术的迷信，以及他服丹中毒隐情。

然而，这小小的失误，却使年青的皇帝迈出了他初政的第一步，它预示着一个充满青春活力、锐意改革的新政即将开始了。

事实上，乾隆从父亲的手里，承继的是一份几乎可以使所有有帝王都为之歆羡的基业。大清王朝，历经几代人的努力，到他登基之时，业已国家升平，民物晏安。作为一个步入太平盛世的天子，弘历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年青的皇帝，绝非平庸之辈，他在喜悦与兴奋的同时，感到了这份家业的分量，意识到治理和驾驭这个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绝非易事。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激励着他发奋振作，让他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乾隆无疑是一个福命的皇帝，他一帆风顺地登上了皇位，面临的是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时局。他没有遇到太多的棘手的问题，更没有遇到爆炸性的危机。但是他同样面临着急待解决的社会矛盾，面临着需要调整和治理的国家政治。而对于刚刚继位的乾隆来说，最大的问题，莫过于雍正年间父亲实行铁腕政治所造成的后遗症。

雍正后期，长大成人的乾隆已封为宝亲王，在奉命参予政务的过程中，他深切地体验到了雍正的统治手段，他钦佩父亲的才干和魄力，但同时又对父亲的严刻猜忌不满。直觉和感受使他意识到，雍正以强权政治诛戮宗室，打击异己，虽然巩固了自己的皇位，却使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片哀怨声中。封建专制政治下，本来就不存在平和宽松的气氛，而雍正帝的严刑峻法，更是将人们置于一种恐惧不安、提心吊胆的境地之中，人人怀着惴惴之心打发着岁月，社会和官场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传播着不满的情绪。这对于一个肩负守成重托的君主来说，绝非好的兆头。何况乾隆与父亲之间不仅存在着情格差异，且有政治上的分歧。

乾隆是主张宽大为治的，尽管他的父皇每每以他赋性宽缓训诫教诲。然而，一旦他君临天下，昔日的政治见解，仍会执着地变成国家的法令政策，促使他去作一番尝试的。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乾隆颁布谕旨，明确宣称：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政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记》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

于是，在宽猛相济的口号下，一个又一个调整前朝统治政策的法令措施，颁行于全国。

——他禁止地方清丈土地，虚报开垦。

——禁止工程捐派。

——废弃由官府掌管民间房地产交易的“契纸契根法”，还民买卖自由。

——停止没有实效的“营田水利法”和复古的“井田制”。

——恩诏蠲免各省民户积欠钱粮。

在乾隆看来，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实为扰累闾阎之政，而他的新政，则要减去一切繁苛，与民休息。

然而，乾隆深知。他的父亲一生中备受指责而致声名狼藉的是对宗室兄弟的残忍无情。不管在这场争夺帝位的斗急中，父亲有多少不得已的苦衷，都无法摘脱残害手足的恶名。他的大伯父允禔，二伯父允初都是在康熙朝被禁锢的，父亲没有释放他们，二人都死在高墙之

内。三伯父允祉，十叔允禩，十四叔允禴也被永远圈禁。最悲惨是他的八叔允禩，九叔允禑，他们被削籍禁锢，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在受尽百般折磨后，又被秘密处死。而且，这场骨肉相残的斗争，株连甚广，五叔允禩之子弘升，七叔允祐之子弘曙也因此被削去世子，而宗室之中，被关被杀，削籍夺爵，抄家流放者更是不计其数。父亲甚至连亲生的儿子也没有放过，三哥弘时同样被黜革宗室。

皇家内院，历来最薄亲情，骨肉杀戮的悲剧，几乎无代不有。然而如雍正之严酷者，仍属鲜见，这使他的政治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

乾隆亲身经历了这场家庭的惨变，对其中的利弊曲折，自然有他自己判断。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八日，即位刚刚一个多月的皇帝，便针对这桩历史公案，发布了第一个带有倾向性的诏旨：

允禩、允禑，孽由自作，得罪已死，但其子孙仍是天潢支派，若俱屏弃宗牒之外，与庶民无异。当初办理此事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处理之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见，确议具奏。”

在以“孝悌”治天下的思想制约下，乾隆不便为父亲的政敌公开翻案，但却要消除来自父亲严猛政治的弊端，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好在皇权至上，皇帝可以生杀人，荣辱人，更可以嫁祸于人。他宣称“当初办理此事，乃诸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即为父亲摆脱了干系，又为自己找到了翻案的理由。

两天之后，乾隆命令宗人府查明因罪革退宗室觉罗，分别赐予红带、紫带、载入了玉牒，一大批皇子皇孙恢复了名号。

一个月后，雍正的死敌阿其那，塞思黑之子孙，也被收入玉牒，给了红带子。

接着，又有许多被禁高墙的宗室王公重见了天日，新德、新福、云乔顺、宗敫、鄂齐、丰库、裕伸、德存、勇端、讷尔苏、广宁、扬德、华玠等人，均被释放回家。就连最重要的案犯允禩，允禴也被解除了圈禁，赐以公爵，允禴尤以亲叔父受到眷顾。

据朝鲜使臣的记载，乾隆欲将允禴被囚十三年的应得俸禄一一归还，允禴坚辞不受。但乾隆还是千方百计地欲使叔父得到“补偿”，他将以告发其父发迹封王的允禴长子弘春革去郡王爵位，圈禁在家，至乾隆十三年，封允禴为恂郡王。

此外，乾隆更没有忘记为他死去的三哥弘时昭雪，他给还弘时的皇子身份，令收入玉牒。

短短数日之内，乾隆为父亲了结了这场结怨颇深的历史公案。他虽然没有平反全部的案情，却改变了对所有案犯的过重的处分，顺从了民意，这实质上是翻了雍正所定的旧案，但乾隆却一再声称，这是遵照父亲的本意。新皇帝的干练和精明，已写在这一道道翻案的谕旨上。

随着宗室王的获释，对全国狱案的纠偏继之而起，一些无辜蒙冤、罪轻罚重的官吏士子，也从枷锁之下解放出来，因贻误军机判处死刑的骁将傅尔丹，以朋党之罪处斩监候的总督蔡珽，以及诽谤程朱、发配军台的谢济世，均被赦免。就连文字狱要犯查嗣廷，汪景祺的家属也被恩诏释罪。那些因亏空钱粮，侵吞公帑被罢被革的官吏，更是一体宽释。

皇帝的朱笔之下，每日都响起震动天地的惊雷。宽大政治就像一股春风，将新皇的“宽仁”送到了王府官邸，也送到了黎民百姓之家。

但“宽仁”的新帝，却不同于普度众生的菩萨。在乾隆处理雍正的积案时，不是一律从宽，还有一些由宽改严的案例，如对曾静，张熙案的处理。

曾静是湖南的士子，张熙是曾静的学生。二人因接受了清初学者吕留良的华夷之辨的反清思想，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起兵反清。并且道听途方，收集了一些来自宫廷的流言，斥责雍正帝弑父篡立，屠戮兄弟，逼杀生母，淫杀父妾。而这些耸人听闻的奇传，把雍正说成了大逆不道的罪人。

奇怪的是，一向刻薄寡恩的雍正帝只将死去四十余年的吕留良开棺戮尸，戚属坐罪株连。却把犯下十恶不赦之罪的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颁旨告诫子孙将来亦不得因曾，张诋毁自己而追究诛戮。更令人不解的是，雍正皇帝对曾静、张熙的反清思想及其散布的流言蜚语，进行了公开的辩驳，刊刻《大义觉迷录》一书颁行全国，令地方官每月朔望宣讲。这种越描越黑，越搅越混的辟谣手法，使各种真真假假的政治流言，成为遐迩皆知的宫廷新闻，反倒搞臭了自己。精明一世的雍正皇帝，竟因一时糊涂，干下了绝大的蠢事。

乾隆早就对父亲这种不明智的作法，叫苦不迭。他一上台，便不顾父亲的诏命，将曾静、张熙锁拿解京，凌迟处死，勒令停止宣讲《大义觉迷录》，命各督抚将原书汇送礼部收存。从而结束了这场拙劣的闹剧。

几个月后，新政便为乾隆皇帝树立起宽仁而英明的形象，为他赢

得了臣民的拥戴。在时人留下笔墨中，有这样的记载：

“高宗（乾隆）登基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睹闻，莫不蹈舞。”

“纯皇帝（乾隆即位，承究皇雍正）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乾隆的皇位稳固了，这些颂词就是最好的证明。

然而，成功的新政，带给皇帝的并非尽是赞誉和欢声，他同样有烦恼和愤怒。因为历史上的任何新政，都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去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前提的。乾隆在推行宽大政治的过程中，自然谴责和压制了那些以推行严猛政治发迹的官员，雍正帝的得力大臣田文镜就被乾隆点名申饬。于是，新政遭来了誉议。

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署四川巡抚王士俊密书上奏说：“近日条陈，唯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说，传之天下，甚骇听闻。”

这明明是指责乾隆皇帝翻了雍正的旧案。

尽管王士俊含沙射影，但在乾隆看来，却一针见血地点破了新政的实质。“是谓朕为翻案矣。”这使乾隆大为恼火。

清代帝王历来重视“祖制”、“家法”，处处标榜“敬天”、“法祖”的信条，因而，乾隆的新政，虽然在全面地调整雍正以来严苛政治的弊端，但他却不止一次地宣称，他是“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再三强调“朕凡用人行事，皆以皇考为法，间有一二事酌量从宽之处，亦系遵奉皇考遗诏，并非故示优容”。也就是说，新政完全符合雍正皇帝的思想和政策，乾隆并没有违背父亲的意愿和成规。而王士俊却公然指责他翻了前朝的旧案，这不啻说他背弃了祖制家法吗！这是多么严重的失德和不孝。

乾隆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种“诽谤”和中伤，他怒不可遏，大骂王士俊“佞邪小人”，诏令立即将他拿解京师问罪。

王士俊撞到了枪口上，却也命当如此。他本是贵州平越人，康熙末年进士，雍正时期，以刻削鲠直闻名，钻营至封疆大吏。先任湖北巡抚，后又继田文镜为河东总督，管辖河南山东。在豫三年，行政为人一如田文镜，他垦荒劝捐，严行不殆，虽博得了能吏的美名，也成累民之祸害。乾隆一上台，立即将他革职解任。半年之后，才又任命他为署四川巡抚，然而，降革与复起之间，已是官声扫地。

雍乾交替，政风陡移，王士俊见旧法不存，人心不古，已是寸心怅惘，感慨万千。再加上官职由总督贬为巡抚，还是个没有实授的署

巡抚，更是牢骚满腹，骨鲠在喉。因而，他刚到四川，便遏止不住涌上心头的怨气，直接了当指责了这场风靡全国的翻案潮。

于是，王士俊成了乾隆帝的靶子，他要借此杀一警百。但乾隆深知，王士俊所代表的是一股势力，一股因循守旧的顽固势力，要铲除它，还需花些功夫。他将诸王大臣及六部九卿科道各官召入宫内，进行了公开的辩驳。他忿忿的说：

“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相济。……朕只遵明训，凡用人行政，兢兢以皇考诚民育物之心为心，以皇考执两用中之政为政”。“及王士俊譬为翻驳前案，是诚何言？是诚何心耶？”

王士俊以如此悖逆之言，妄行陈奏，已犯下了死罪。

九月，诸王大臣议其为恣行讹谤罪，请照大不敬拟斩立决。但乾隆不愿破坏自己的宽仁形象，从轻判定王士俊斩监候。两年之后，王士俊蒙恩获释，又被削职为民，赶回了老家。

处置了王士俊，乾隆有种兴奋而沉重的感觉。这是他即位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反对者。他发现自己并非一味的心慈手软，同样懂得在必要的时候，以铁腕手段维护皇权的尊严。然而，王士俊敢于如此顶撞他，却使他陷入了无可名状的忧郁中……

虽然乾隆斥责王士俊“外饰鲠直，以便己私”却也不得不暗暗佩服他的胆量，赞叹他对前朝的忠心。直觉使乾隆意识到，他这个新皇帝与旧臣之间仍然存在难以沟通的隔阂，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护他的新政，在前朝的遗老中，不乏怀旧之人。但在这满朝文武当中，又有哪一个不是父亲的遗老旧臣呢？他产生了一种孤独感。

乾隆是在先朝重臣的拥戴下登上皇位的，他没有自己的亲信。雍正皇帝鉴于他们兄弟争立的教训，对自己的儿子防范严密，乾隆弟兄们与前一辈的皇无法相比，他们没有形成自己的藩邸私属的机会。而备位皇储的乾隆更是一直留居宫中。一言一行都在雍正的眼皮底下，很少属于自己的私人。所以，到他即位之时，除了“用人唯旧”之外，别无选择。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今朕所用之人，皆皇考所用之人。”

用人唯旧，避免了新旧臣僚之间的相互倾轧，也避免了因人事更迭所造成的人心浮动。然而，乾隆却并不感激父亲为他安排的这种平稳的政局，当他登上御座，俯视那些虽堆满谦恭之气却是相当陌生的面孔时，心里总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对于一个经验不足的青年皇帝来说，驾驭那些久经政治风雨的老臣，确实不能不煞费苦心。

但乾隆实在是福命的皇帝，尽管他一即位便处在老臣的包围中，

却不曾遇到来自臣僚的挟制，在那些阿谀和战栗的背后，也没有发现阴谋和不轨。也许他真该感激他的父亲。雍正的高压政治已经浸透了大小官员的灵魂，使他们在皇权面前俯首贴耳。

尽管如此，乾隆的心里仍然没有踏实感。专制政治，人君高高在上，却又深居九重，在与外世隔绝的情况下，政事只好委之大臣。在没有心腹股肱的情况下，乾隆又怎能放心得下呢？于是新皇帝在即位的第三天，就恢复了“密折制度”。

密折，也就是臣下上奏皇帝的机密奏折。它始于康熙年间，在雍正朝形成了严格的制度，成为皇帝大权独揽的产物。而密折制度又为乾隆皇帝继承，自然有它特殊的作用。为了搞清它，我们不得不追述密折制度的历史。

清承明制，有损有益。作为封建王朝行政而上通下达的官文书。在清初主要是前朝制度的延续。官员给皇帝的奏章分为两种。一种称“题本”，另一种称“奏本”。题本与奏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报告公务的文书，后者则是报告个人私事的文书。但无论题本还是奏本，都要送交内阁，经内阁票拟后，才能送到皇帝的手中，不但手续复杂，运转迟缓，内阁的意见又不能不对皇帝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对皇帝实行专制统治，显然是个不小的牵制。

有鉴于此，在康熙朝出现了奏折。

康熙皇帝虽以宽仁闻名天下，但在加强皇权方面，他绝不比别人手软。为了对地方官进行监视，他暗中指定少数亲信大臣随时将所见所闻秘密奏上。又为了保密起见，这种奏章都成折叠形式，胡而康熙便称之为“折子”，或“密折”。而后，康熙帝又规定，享有折奏权的官员必须直接与皇帝保持秘密联系。具折人要亲自缮写，不得假手他人，更不得泄露他人。密折写好后，由本人或派专人径送御前，不经内阁。因而，奏折的内容，除了皇帝之外，便无人知道了。

乾隆皇帝恢复密折制度，看中的正是这一点。对于深居大内、外事并未历练的皇帝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了解下情，只有这样，他才能无所牵制地行使手中的权力，才能在变化莫测的官僚政治的风雨中，辨别是是非非。

在这方面他的父亲雍正皇帝给了他更多的影响，也为他留下了更多的借鉴。雍正即位之后，为擦净御座下的斑斑血迹，坐稳潜伏着危机的江山，他需要牢牢控制每一个臣民。为此，雍正皇帝扩大了密折的使用范围，除了中央和高级官员普遍具有折奏权外，作为监察官的科道，也可具折密奏。而且，这些官员须每人每天轮流奏事，

如此一来，密折真正成了皇帝的耳目，密折越多，皇帝所闻越广。而后，随着有些官职较低的藩臬府道提镇官员也蒙特旨具折密疏，密折则完全成为皇帝驾馭群臣的工具了。然而，这其中却不无劳心焦思的筹划。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雍正皇帝规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并屡屡以“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诫谕臣下。鄂尔泰是他的亲信大臣，但当鄂尔泰的侄子、任宁夏道的鄂昌密奏上达后，雍正皇帝批复说：“密之一字最为紧要，不可令一人知之，即汝叔父鄂尔泰亦不必令知”。雍正不愿在皇帝与官员之间，再出现一个中间人，因为无论这个中间人是谁，都有混淆视听的可能。

雍正皇帝是精力过人的。对于臣下的奏折，他除了亲自阅看之外，还要亲自批复，因所批谕旨使用朱笔，故称“朱批”。朱批使皇帝的意志畅通无阻地直达地方。

比起他的父亲来，乾隆没有来自皇位争夺的危机，但他同样面临着如何掌握驾馭群臣的难题，而密折制度无疑是解开这一难题的关键， he 可以从奏折中看到大臣们不敢公开谈论的政事，可以用朱批，批复不便在谕旨中公开发表的指示。而官员之间还可藉此彼此监视，相互牵制，即督抚大员亦不得擅权欺罔。因而，乾隆皇帝在摒弃了父亲的许多严猛统治措施的同时，却毫不迟疑地保留了雍正大力提倡的奏折制度。

乾隆元年八月十三日，他颁布了实行奏折制度的诏旨：

“自古人君为治，莫要于周知庶务，通达下情”。“今初理大敌，正当广为咨諏，以补见闻之所不及。其从前何等官员任其奏事，或有特旨令其奏事者，俱着照前折奏。”

乾隆的用心没有白费。几个月的奏折看下来，他不再望着那山积般的文牍蹙眉出神了。奏折为他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门窗，他由此看到了他所主宰的臣民，所统治的国家。了解了当兴之利，当革之弊。他不再依赖诸王大臣的“辅政”，完全可以独立地去发号施令了。

奏折的作用越突出，乾隆对奏折的处理就越认真，每日晨起进膳后，他便开始批阅奏折。几乎每一份奏折，他都要详细的阅览，不使一字从眼前漏掉。遇有错讹之处，他必指出令其改正。凡属机密，留中不发之件，他往往亲自缄封，有的索性默记心中，将原件当时焚毁。平时如此，巡幸在外也是如此。他从不委人代办。不论他走到哪里，奏折就送到哪里。批阅奏折几乎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份。

事实上，对于乾隆来说，批阅奏折就是在行使手中的权力。乾隆

十三年（1748年）以后，随着奏本文书的废止，奏折的作用更加突出，官员遇有机密政务，往往先以奏折形式报告皇帝，在得到皇帝的首肯后，再以题本的形式向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具奏，但只是为了完成最后的批准手续。乾隆由此实现了大权独揽。

然而，在乾隆强化皇权的道路上，却并非尽是喜悦。他曾经忧虑过、烦恼过。

当雍正使他名正言顺地登上皇位的定座时，却没有给他全权执政之柄，四名辅政大臣的存在，则意味着新皇帝尚不具备亲政的条件。乾隆隐隐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他没有忘记在祖父康熙年幼时辅政大臣鳌拜的专横，而这些历练颇深的老臣对政治的敏感绝不在皇帝之下。辅政大臣刚刚工作了三天，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便向乾隆提出取消“辅政”之名，沿用雍正皇帝居丧时的“总理事务处。”

毫无疑问，他们同样记起了往事，记起了鳌拜如何被亲政后的皇帝逮治问罪。

前车之鉴，触目惊心。于是，乾隆群臣之间第一次就权力问题而产生的芥蒂，便如此顺利地解决了，而随着辅政大臣变成了总理事务大臣，皇权的地位无形中突出了。

只是旧的矛盾刚刚解决，新的矛盾便摆在了皇帝面前，作为乾隆居丧期间的全国最高决策机构——总理事务处仍然不能令他满意。短短数月之间，他和几位总理事务大臣已因权限不明发生了好几起摩擦，这使乾隆满心的不快，为了限制他们，分散他们的权力，乾隆又任命平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朱轼、公讷亲，尚书海望等人协办总理事务。但他仍然觉得不能得心应手。

乾隆是一个绝对专制主义者，这一点他酷似他的父亲雍正。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宣称：“盖权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因而，不能把握手中的权力，他是决不会甘心的，而他所受的教育，所面临的环境，所遇到的问题，都促使他更加醉心于集权政治，提醒他抓住一切机会去实现它。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善于思索的头脑。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服丧二十七个月、刚刚脱掉孝服的皇帝，便借庄亲王等人奏辞总理事务，宣布撤消了总理事务处，恢复雍正年间的军机处。他任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为军机大臣。于是，乾隆皇帝以先朝旧臣组织起属于自己的权力机构，他看中了军机处的形式。

军机处，是雍正皇帝的杰作。然而乾隆皇帝却使它增色，增辉。